

文化交流資料叢刊

11

席勒與民族

對外文化聯絡局編印

一九五五年四月

席勒與民族

關於席勒的發展和他對德國文學及德國民族的重要性，我們先引述席勒在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封信裏的幾行話來展開我們的觀察。

克里斯蒂央·歌特弗里德·刻爾納，席勒的忠實的朋友，是接受這封信的人。燕那是發信的地點。自從他倆定交以來，席勒已經養成一種習慣，把他的計劃、研究和領悟經常地報告給刻爾納。而每封這樣的信對於這位偉大的寫信者同時成了一種自我總結和自我批評。他的戲劇作家的稟賦也在這些友誼通信上面留下了烙印：席勒把他的不同的設計和草案好像演戲一般展開在他的朋友眼前，讓反面的主張好像行動着的反面角色一樣登上舞台。在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裏報告他打算替德國民衆寫一篇偉大的史詩式的民族歌曲。他相信他已經掌握了技巧，這是他每每先自檢查一過的。但對他艱難和充滿着矛盾的却是這個問題本身：一個德意志的民族史詩。在這信裏又有這樣一些意義很重要的句子：『沒有一個文學作家，儘管他是個世界公民，在思想方面，在他的想像的方式裏能夠逃脫他的祖國。光是在打上他自己烙印的語言方面，就已經足夠使他局限在某一種形式裏面，而給予他的作品以一種民族特性。設若他選取了一個外國題材，那麼這題材就常常會同表達的形式處於矛盾狀態。相反地，在他祖國的

題材裏是內容和形式本來就處在自然的關係中。況且一個民族對於它的民族性的英雄讚歌的興趣，也是我們要注意的……』以後，席勒就從事於他想做的這樁事情，這就是他計劃中的德意志英雄史詩的真正題材。自從他三年以前，在一七八八年，他讀了和評論了幾本關於普魯士王腓特烈第二的歷史著作，他起了念頭，心想可否把他（指腓特烈第二）作為這樣一個史詩的主角。刻爾納，作為一個撒克遜人他應該屬於腓特烈的仇敵的，却首先慫恿他寫成這腓特烈史詩。席勒聽從了這建議，但在一七八八年十月二十日他寫給刻爾納的頭一封信裏就表示了一種輕微的抗拒而讓刻爾納知道，這觀念似乎是『不可厚非的』，祇是『對我早來了六年到八年』。他是把這項討論推延下去了。但是在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他不再躲避這項討論，而對這朋友解釋為什麼他必須放棄這題目。他的決斷和他的理由對於席勒和對於這時代是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的。他這樣地說：『腓特烈第二不是對我適合的題材，我的理由，你也許不以為足夠重要。我對這個性格不能愛好，他不能那樣的感動我，使我挑負起把他理想化的巨大的工作』。這封重要信裏其他的申述也對於後世有很豐富的啓發。席勒以為從事於寫瑞典王古斯他夫·阿多夫是更有收穫些。現在我們必須曉得，這位異邦（按瑞典對德國本是異邦）的國王自從他在呂層戰役陣亡以後，在德國新教市民的意識裏擴大成為德國的民族的英雄形象了。弗蘭茨·梅林把他的服務於法國的民族政策中的歷史作用已經作為神話來摧毀了，提出了不可爭辯的證據。三十年戰爭中一大部份的進步的德國詩歌歌頌着古斯他夫·阿多夫為一個所謂的德

國自由的捍衛者，反抗着帝國的分裂，反抗着王侯的任性專制及德國臣僚關係的可憐相。席勒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古斯他夫·阿多夫。但是他看得更多些。依他對他的朋友的繼續報告，人們必須從德國的宗教改革史出發而把這三十年戰爭在它和它的緊密的歷史關聯中來敘述。由此人們纔能够——在這裏我們又覺察到席勒的一種介乎民族歷史的觀點和世界公民的觀點中的矛盾——全面地把『人類的全部歷史完全地毫不勉強地』在德國的具體例證上來論證和解說。在古斯他夫·阿多夫這裏，一種『理想化的巨大工作』是不需的，不像在普王腓特烈那裏是必要的；而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和內容豐富的題材可能『成功爲一個優越的東西』。

如所週知，這個寫古斯他夫·阿多夫王的史詩計劃也被席勒放棄了。但是對於他的創造的方式，不僅僅在那介於一七八八年和一七九一年的時期，對於他的整個對待民族文藝和德國民族文學的關係，這個插曲是差不多具有象徵的意義的。

這裏有一位詩人，在那時期的德國文學裏可以稱許爲一個具有完全不尋常的高度的政治性的詩人。他常常向刻爾納解說，從普遍性的哲學的觀念裏頭是不能引導出文藝創作的。文藝必須緊密地靠攏於歷史行動和歷史關聯。它必須（我們今天將要說）是『具體歷史的』。於是席勒在近代德國歷史中尋找這樣的題材，這題材裏的事件經過和中心角色都可以燃起詩的想像的。但是他尋不到。那個普魯士王（譯者按：即前面說的腓特烈第二，就是著名的腓特烈大帝）在一七八六年死的時候席勒已是壯年，但是要

把他寫成英雄，仍需大量的粉飾和理想化。在他的具體的歷史的形象裏他是不合用的。而把一個瑞典國王作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未免是一矛盾。

這裏我們覺察到席勒的文藝形象裏的基本衝突。席勒後來在他的一首詩裏叫出：『但是這個偉大的瞬刻碰到渺小的一代人』。歌德曾在一七九五年發表一篇著名的論文『文藝的桑苦樂主義』（桑苦樂主義即放肆主義）他這樣地描述着：『一個有重要意義的著作，就同一篇有重要意義的演說一樣，只是生活的結果。文藝作家和行動的人物都不能製造他在裏面誕生和在裏面作用着的環境。每個人，就是最大的天才，也要從他的世紀感染到某些特質（按指不好的特質）而從另一些特質得到好處，一個優良的民族作家我們只能向民族自己來要求』。席勒的上面所說的也正是觸到這項題目。歌德在這篇論文的另一處又發揮道：『人若把這些條件……對照着這些最好的德國作家在其中工作的環境，人就會，假使他看得清楚和思想公正，驚佩他們所已成就的而悼惜他們所失敗的。』我們看到，十八世紀末期德國的不健康不成熟的狀況和當時德國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人物底壯健的精神努力與藝術努力中間的衝突，已經被這兩位詩人完全尖銳地覺察到了。創造一個德國民族文學，產生德國的史詩，而不曾在自己國土裏找到適合的配得上的題材，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的矛盾。我們不能把席勒向唯心主義方面的轉變，看做一個簡單的逃避，逃避到內心和唯美的假相世界，這是完全錯誤的。何況他的這種轉向並不是最後的決定而在他的短促生命的末尾又被他自己否定了的呢。這裏是席勒的發展中存在着的

深刻的矛盾，這矛盾被他自己尖銳地和痛苦地感觸到，因為它是來自他對那時期德國現實情況的洞察。在席勒的這些矛盾裏面，在他的徬徨於唯心主義與現實主義，政治性的文學與非政治性文學，德意志民族文學與抽象的世界主義，正反映着十八世紀末尾德國的現實的動態。

年青的恩格斯在一篇用英文寫的研究裏論到十八世紀德國的地位和歌德、席勒必須在那裏面生長和發展的客觀條件，這是一篇到現在不能超越的精深分析。我們引用「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與文學」集子裏的德譯：「到處是一團腐爛和令人厭惡的墮落。沒有人感到舒服。行業，商務，工業和地方的農業幾乎完全破產；農民，商人，廠主感受到吸血的政府與營業不振的雙重壓迫。貴族與王侯們雖有他的下屬替他們加緊壓榨，仍然是趕不上他們的日益增漲的開銷。一切都出了毛病。在全國是普遍的不滿。沒有教育，沒有影響大衆頭腦的媒介，沒有自由的報紙，沒有公民意識，連一個廣泛一些的對外貿易也沒有——祇有小氣和自私——一種小氣的諂媚的可憐相的市儈氣質瀰漫着整個民族。

一切都消耗完了，崩潰着，走向加速度的毀滅，並且絲毫改善的希望也沒有。在民族裏面連清除那些死掉了的制度的腐爛屍體的微力都沒有了。」

這個時期的偉大的德國文學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恩格斯也強調着：「這個悽慘的政治和社會的世紀，却同時是德國的偉大文學的世紀。」這個成長着的文學必須同那悽慘的狀況相糾纏——而這鬥爭的痕跡也作為瘡疤帶到後世。那個時代的大詩人——恩格斯在這裏提出歌德與席

勒的名字——總是拿反抗的和挑戰的作品來開始。但是文學不能改變現狀，僅只停留在「反抗與挑戰」的文藝創作。當歌德的「葛茲」（劇本名，即葛茲·封·伯利興根）號召德國人爲自由鬥爭時，沒有響應。席勒的「強盜」一七八二年一月十三日在曼漢姆第一次上演時引起強大的震動與風暴似的讚揚。但是對於德國的狀況無所改變。不久席勒的第二劇本「菲斯科」在舞台上也是一個失敗，以致席勒必須寫道：「觀眾不了解菲斯科。民主的自由在這個國土是個沒有意義的聲響，一個空名詞——在普發爾茲人的血管裏不流羅馬人的血」。但這並不是曼漢姆人有否稟具羅馬人品德的問題，而是那種鬱悶的腐爛的空氣，像以後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回顧着這時期及法國革命的終結在他的「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引論」裏所提及的：「我們分有了近代民族的復辟（Restoration）而不曾分有他們的革命。我們復辟了，第一，因爲別的民族敢於革命，而第二，因爲別的民族遭受到反革命……」。這裏是一方面產生着詩人的歷史——政治的願望與德國實際可能性中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產生着席勒對德國民族文學的自覺的努力與當時德國不成熟的狀況在他宇宙觀裏留下的影響之間的矛盾。

所以我們既不應該無批判地不辯證地把席勒尊奉做偶像，也不應該一揮手把他作爲「無用的唯心主義者」推到旁邊去。對於我們民族文化偉大成就的批判地吸收是意味着揭露矛盾並從時代的條件中理解這些矛盾；它意味着精細地分別偉大的長存的和渺小的小氣的東西。我們首先要從發展方面來考察席勒。德國的大詩人中他恐怕是變化最

多的一個。席勒死後歌德曾經表示：『如果人在八天以後重新看見他，會發現他變了樣，人要驚奇而不知道怎樣纔能抓住他。』席勒的這些變化我們要從人體上去探索並指出，這些變化並不是來源於不可靠性、遊戲的不嚴肅性或具體性的貧乏，而相反地應該看做是一個熱情的政治性的藝術家對於時代的每一新事變不斷地爭取理解。

我們若要在席勒的精神與藝術的歷史中尋找決定性的層次和段落，就不難分別三個階段。在這些階段裏都是關涉着德國政治，文化與文藝。青年的席勒研究這些問題，是在法國革命爆發以前的年代，主要的是從一七八二到一七八九的時代，從『強盜』到巴斯蒂監獄的摧陷，這大致就是席勒在燕那大學開始講學的同時。第二個階段標誌着這位詩人，哲學家與歷史家對法國大革命的爭取理解。這一階段約有十年：從一七八九到十八世紀之末。這是革命運動上升年代，熱月（Thermidor），督政府，到霧月十八日拿破崙波拿巴特（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落在這個時期內的是席勒同歌德的訂交，有名的歌謠年一七九七；一七九九年三月『華倫斯坦』的完成，這也是席勒的文學演進的一個階段。由於這，詩人席勒，尤其是戲劇作家的席勒，重新尋到了自己。長久歲月的哲學玄思，哲學的唯心主義的玄理詩在一個題材取自德國民族史的偉大劇曲裏獲得它們的結束。以前一七九一年由於古斯他夫·阿多夫引起的，又被擱置了的計劃，現在用新的內容在新的形式中得到實現了，這就是：德國三十年戰爭歷史中的一些問題作為德國狀況和演進的說明。就同拿破崙奪取政權前的那個法國歷史階段基本上正和席勒對法國革命爭取

理解以及他重新轉向德國民族問題是同時的一樣，我們也可以把他的生命與創作的最後的一階段——從新世紀開始到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席勒的死——作為詩人不斷地爭取理解時代事變的時期。當時德國在外國的統治中。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開始崩潰，德國的舊制統治到了末日，但這是由於法國的干涉。法國軍隊在德國境內。這時席勒所要努力解決的德國問題不僅僅是創作民族詩歌與民族文學的可能性，而是民族的自由與民族獨立。詩人最後的幾年又熱情地轉向歷史的現實，轉向當時的德意志的命運，這是明白清楚的，也是對一些把這事不確當地簡單化的人所必須強調指出的。固然在席勒的晚年同他最後的大作品中也令人覺察到唯心主義的殘餘痕跡和內在矛盾：這些殘餘的唯心主義並且也在「威廉·退爾」（劇本）裏面存在着。但是在進一步精細的研究之後，我們必須認識，在新的較高的階層我們看到席勒在他的最後的大作品中有一種堅決的現實主義的文藝傾向，用歌德的話——就是轉向「當天的要求」。（Forderung des Tages）

青 年 的 席 勒

席勒的青年期是德國的不幸（貧困淒慘）的一個動人的見證。菲蘭茨·梅林一九〇五年在他的「為德國青年的生活畫像」裏面用莊重的感動人的形式把它描寫了：那一對父母，那個符騰堡城的軍官同「幸運的兵」，如梅林所稱呼的，那個勒卡爾城馬爾巴赫的當爐女，那個卡爾歐根公爵，德國最無恥的割據諸侯之一，他的可惡的生活及統

治時期，他的迫害舒巴特以及後來迫害青年席勒，只使他落得一個極可恥的不朽（遺臭萬年）；盧德維希堡附近的臭名遠揚的卡爾學校，原來是公爵的軍事學院，卡爾把他改成一個發揮野心虛榮的教練學校，這對於該校的原來性質並沒改變。詩人克里斯蒂映·菲德利·但尼爾·舒巴特很有理由把它叫做「奴隸培植所」。這時期已經退休的軍官約翰·卡斯帕·席勒的兒子，年青的約翰·克利斯陀夫·菲德利·席勒，也被公爵塞進這個學校。

八年之久，從一七七二到一七八〇，席勒必須進這個學校。而席勒却獲得充分的機會把符騰堡公國的政治體系，國家與朝廷的關係從近處用自己的觀察來認識；不但是「強盜」的題詞（卷頭語），還有箴言「在暴政中」及「反對暴君」，都是從這些生活經驗產生的；還有像他在「陰謀與戀愛」劇本中描寫的一個德國小朝廷的狀況，瓦爾特的罪犯型的大臣們，公爵的姘婦們，伺探與詭詐的秘書烏爾孟，卡爾布的既空洞淺薄而又好陰謀的宮廷侍衛官們，這個世界席勒在那個時期把它熟悉了。青年席勒先是讀法律科學，他沒有興趣。然後他選了醫學來逃脫法學，雖然醫學對他也沒有更強大些的吸引力，他却讀了很多書。先是在卡爾學校，後來是在斯圖嘉城當軍醫的時候。特別是當時的新文藝，首先是讀那些「反抗與挑戰」的文藝作品——人們認為「狂飈與突進」運動的證件，他的年長二十歲的鄉前輩舒巴特的熱烈控訴着的抒情詩——少年歌德的創作「葛茲」，「維特」，「普羅米修斯」。

席勒的「強盜」的發表和以後在曼漢姆的初次上演，引起了他對他的「地方首長」的著名鬥爭，這已是衆所週

知的事了。公爵簡捷了當地禁止他這個革命的、聰明而危險的臣屬再有文學創作。這個糾紛的出路就是席勒偕同他朋友音樂家安得萊士・斯特耐歇爾在這年（一七八二）九月二十二日喬裝化名偷偷地離開他的家鄉斯圖嘉城逃往曼漢姆。

接着來的是作為劇評家與曼漢姆劇院作家生活的艱難的歲月。向他的保護者達爾柏男爵的爭取了解。達爾柏不願為了這一個「逃亡者」損害他同符騰堡公爵的關係；負債，焦慮，基本上由他一個人執筆的雜誌「塔利亞」計劃的擱淺和失敗；他同貴族女子沙洛特・封・卡爾布的戀愛史也以不幸結束。在曼漢姆，他的生活愈來愈不堪。因此當他這時新結交的朋友克利斯蒂央・刻爾納邀他到萊比錫城去的時候，他就答應了。一七八五年他在萊比錫城門外哥莉絲小村莊度夏，寫成他的名作「快樂頌」（但這是還沒完全證實的傳說）這詩後來構成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末段的歌曲內容。一七八五年秋天席勒遷居到德累斯頓及洛希維茲往就刻爾納。他住在他的朋友那裏，但他是作客，還沒有真正的收入。這種生活也不能持久，尤其對席勒這個熱心於有力克服人生任務的人終於不堪忍受。他在德累斯頓完成了「唐・卡洛斯」然後在一七八九年七月旅行到魏瑪。公爵卡爾・奧古士特號稱為德國文藝的推動者和代言人。魏蘭早已住在那裏，公爵召請了歌德，而歌德又拖來了海岱爾。於是席勒願意在這同一個城內，在同一個朝廷面前建立他的詩人地位。但是他在魏瑪的第一次的居留成了他的大幻滅。沙洛特・封・卡爾布固然幫忙，把他引進朝廷，見了公爵的母親安娜・阿瑪利亞。而他的「唐・卡

洛斯〕却遭受到冷淡。歌德當時還在義大利遊歷。海岱爾對這位〔強盜〕的詩人表示得很冷落；魏蘭很客氣，但不負責任。此外在魏瑪充滿了小集團，小圈子，充滿了敵視和對立。〔糟糕，同時和魏蘭及海岱爾交朋友是一樁不能調和的事。〕席勒在一七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封信裏這樣寫着。他和魏瑪宮廷社會裏一些女士們來往，他計劃結婚，而他只知道他想結婚，却不知道究竟同誰。文學他已厭惡。〔唐·卡洛斯〕是一個失敗。於是他鑽進歷史的研究，他希望由此得點收入，並且或可由此得到一個教書位置。一七八八年一月七日他寫給刻爾納的一封信裏發牢騷說：〔我三年努力的成果，〔唐·卡洛斯〕，獲得的報酬是不愉快的。我五個月，至多六個月寫成的荷蘭歷史大概會使我成爲一個名人〕。

在魏瑪他認識了一雙貴族的姊妹，朗格菲德小姐們，她們邀請他到她們的洛多城附近的莊園裏去。這一雙姊妹裏的一位，沙洛特·封·朗格菲德，後來做了席勒的妻子。一七八八年歌德回來了，但進一步的接近，甚至結成朋友，還是不能做到。他在信裏告訴刻爾納說：〔我懷疑，我們是否能夠彼此接近〕。但在一七八八年之末，——席勒已是二十九歲，已經發表了許多作爲抒情詩人與戲劇作家、作爲文藝批評家和歷史家有價值的東西，但是還沒有固定的職業及經常的收入——由於歌德的斡旋他被聘爲燕那大學的歷史教授。一七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法蘭西王國的將官階層在巴黎集會（按指三級會議）法國大革命以此開端的幾個星期以後，席勒在大教室裏面對衆多學生舉行他的就職講演，題目是〔什麼叫做和爲什麼要研

究通史？』於是席勒終於有了一個位置和固定職業。他必須在這個夏季學期裏每星期二的六點到七點講授世界史導論。所以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二晚間我們看見菲德利·席勒教授在燕那大學講壇之上，而同一天，同一時間巴黎民衆在快樂興奮的長陣中正從巴斯蒂監獄回到市政廳。巴斯蒂的堅強堡壘已經在這大都市的人心中被打破了。革命奏着進行曲。

在燕那，席勒在多年困苦、徬徨、失敗之後，才得到了穩定的生活。他所就的並不是重要的職位。學生們的熱烈歡迎基本上還是針對着那位先前的文壇巨匠，「強盜」，「菲斯科」，「陰謀與戀愛」的作者，正如一位聽講者在家信裏所寫的。人們懷着好奇的心，來看昨日的暴君反對者今天站在學院教師的職位上。我們也不應把後來和現在對大學教授的地位的觀念聯系到那個時候。一七八九年的德國大學裏主要的是教學業務；教師們照着預先寫好的提綱講授教材；個人的學術性的發揮是不允許的。對席勒也是這樣。寫席勒傳記的萊因哈·布里瓦德很正確地提到，哲學教授康德在他的講台上也一輩子必須照着別人所擬的提綱來處理他的哲學題目。何況席勒還不是正規的教授。他具有教授名義，有權收取聽講費，而沒有正式薪俸。歌德之所以能够促成席勒的聘任，因為這對於公爵是「不花費的開支」。席勒教學業務的實際情形並不全像這第一學期開講時的盛況。在第二學期裏由於一些不恰當的事情及誤會他只有三十個聽衆，這裏面只有十個人繳了聽講費。所以不足驚異，席勒在這年年底已感到他的教學職務是一個負擔，而重新運用他的玄思精神的全部力量，他的外交

稟賦和他作爲一個書信家的說服能力來爲他的創作事業尋找物質基礎。

席勒的少年歷史以燕那的就職也在表面上告了一個結束。從這時起他留在魏瑪公國了。由於他同歌德進一步的結識最後產生了我們兩大詩人那有名的友誼與合作。歌德幫助他解除了燕那大學的教職，他成了魏瑪宮廷的樞密官，最後卡爾·奧古士特公爵替他弄到御賜的封爵。而席勒却祇是從當時的實用觀點來看待這項尊榮。一八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一封寫給刻爾納的信裏談到這樁事：

『我的聯襟（指他的妻子的姐夫）在朝廷據有最高的地位，他可能助成了這樁事；因爲姊妹倆中間的一個在朝廷裏身居高貴的等級而另一個却根本不能走進朝廷，這是有些令人奇怪的，雖然我的妻子同我與朝廷也有許多關係。這個爵位却把這一切拉平了，因爲我的妻子，她原本出身貴族，由此恢復了我們結婚前的權利；否則我的爵位對她也沒有什麼幫助。對於我的妻子這是有些好處的，對於我的孩子們將來也有些好處。對於我自己自然沒有什麼大收穫。固然，在一個小城裏，像魏瑪，能够在各方面不被摒在門外這是有益的。在一個大城市裏人們根本不在意的，在這裏却會感到不愉快。』

直接的困苦是沒有了。他有可能來克服和他生命成就最後十年的巨大的精神的和文學的勞作了。席勒現在成爲著名的被爭取的作家。但青年時期的艱苦，困厄與逃亡，奔忙與失敗已經把他的體力消耗完了。在他致死的肺病出現以前，我們就已看見他不斷地在病危及衰弱狀況裏面。當他在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從苦痛解脫以後，檢驗屍體的

醫生證實幾乎他所有的器官却損壞了。

這個戰鬥和困苦時代，這個席勒的青年期却同時也是一個壯烈地、常常還是暴烈地對他的時代狀況爭取精神理解的過程，精確些說：就是對於德國的狀況，像我們上面首先做了大體的說明的，後來我們又在青年席勒的生活經歷裏所表白的。人們一般地把席勒的初期列入所謂「狂飈與突進」運動。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的。一七七〇到七一年有一羣青年人在分裂了的割據的德國的不同地點發動一個大的改革運動，這運動主要地表現在文學領域內——這也正表示着德國的不成熟狀況——但也並不缺乏社會改革的性質。對於這運動具有特殊意義和價值的就是從一七七〇春季到次年一七七一年秋季在斯特拉士堡聚攏着的一個青年人的小團體。

在這些青年裏面有約翰·亨利·容格（容格—斯蒂林），里阿波·華格耐，那個里夫蘭人雅各·米黑爾·蘭西和·倫茲，而首要的是那個福蘭克府紳士的兒子與法學大學生約翰·沃爾夫剛·歌德。這些青年們在這裏碰見了那位年紀較長、已經以文學批評者及作家著名的約翰·戈德弗利德·海岱爾。他正陪伴着一個王子到斯特拉士堡來並因為治療眼病要停留一些時候。歌德同海岱爾的晤見却成了「狂飈與突進」運動的真正的誕生鐘點，以及綱領的確定。它的稱號「狂飈與突進」却是從福蘭克府人馬克西米映·克林格爾所寫的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劇本的名字得來的。

這個文藝團體的以及狂飈運動的美學綱領却最好由歌德與海岱爾共同出版的論文集的題名來說明，這就是：

〔關於德意志的形式與藝術〕。

萊森在他的反抗法國古典主義對德國文學的影響中已經用理論證明一個德國民族文學和一個德國民族劇院的可能性。魏蘭已經把德國散文的彈性提到未曾預測到的高度；當時人們把青年的克勞勃斯托克的出現認為是德國語言的偉大的詩人並感覺到是德國文學充滿前途的新生；馬爾克人溫克爾曼指出，希臘的美的概念應該作為模型，同時也就是拒絕流行的法國宮廷所欣賞的藝術。於是在一七七〇年左右對德國的詩人們產生了新的任務與可能性。現在不只是在爭論德國文學的可能性，爭論日爾曼詩神的權利，和別的國家的藝術女神們來競賽，像克勞勃斯托克在一首裏所描寫的：現在對於在一七五〇年誕生的新一代已經有了真正的德國文學作為偉大的模型與範本了。萊森與溫克爾曼廣泛地把錯誤的範本，主要是法國的，作為障礙拒絕了，萊森推薦着英國文學，尤其是莎士比亞，於是狂飈運動者現在從自己的德意志的歷史傳統與藝術傳統裏找尋積極的據點。他們發現了德國歷史，宗教改革時期的偉大的鬥爭；他們描想着德意志造型藝術的美：歌德首先用令人不能忘的演詞讚揚德國建築斯特拉士堡的大教堂。狂飈運動者發現了——這首先是海岱爾的功績——在〔藝術文學〕（指技巧的雕飾的文學）的後面及下面有無限豐富的人民創作的寶藏及可能性：民歌，人民口語，人民音樂與人民史詩。在狂飈運動裏根本拒絕把宮廷的世界、客廳、甚至於中產市民的家庭作為題材。人在人民裏尋找詩歌及口語的新生。年青的倫茲在斯特拉士堡時候就說明得很好：〔假使我們走進所謂平凡人們的屋裏，注意他們的

興趣，他們的情感，在一些愉快的機緣自然流露出來的這些口語既無法在文法也不能在辭典裏找到……我們將要怎樣無限地豐富我們的有素養的語言呵。』

這是完全新的聲響和德國文學裏新的社會目標的擬定。而這却不僅僅是限於斯特拉士堡圈子的特殊綱領，也表現在哥庭根的詩人們的努力，表現在哥特弗利德·褒爾格爾的詩集，一七七八年初版的序裏包含着下述的綱領性的表白：『一個詩歌作品的通俗性是它的圓滿性的印記。』

這個狂飈運動，它包含着那時代最優秀、最進步青年文藝家的熱忱的努力，想克服德國的小諸侯主義與臣僚主義的腐敗難堪，因而首先反省到德意志氣派，民族的語言，藝術與文學。所以這一運動並不和萊森的德國啓蒙運動相對抗，而是它的有意識的繼續發展，作為德國資產階級社會與文化形成的新階段。這是一種運動，它想在文學方面由於同人民中間純樸人們的接觸來更新自己。此外它也是具有極其具體的改造目標的運動。

狂飈運動者企圖德國的統一以克服小國分裂狀態。他們奮全力想在自由的基礎上改造德國的狀況，像歌德的『葛茲』在基本的形象裏所表白的。反對軍人主義，教練與販賣兵士，是此後的文藝題材。司法改革也是創作的對象。耐阿波·瓦格耐的殺嬰兒女犯的命運或歌德的『原始浮士德』中甘淚卿悲劇，是作為改革的任務被表現着。倫茲在『兵士』裏爭取兵士的結婚的權利。他在『宮廷教師』裏面反對宮廷教師式的私人教學，海岱爾起草一個大方案來改革俄國卡特琳娜第二治下的學校制度。哥庭根城的聖林詩社在它的詩歌裏讚美爭取市民自由的鬥爭。封建